



让“好人”当道是体制之幸社会之福



点中银行坐收暴利的“命门”

写在上面的这个题目,是笔者近日有感于一位企业界朋友的遭际而萌发的感慨。近20年前刚结婚时,这位出身于咸阳农家的朋友就以良好的理论素养、精明干练和正派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却长期屈居在厂俱乐部下面的一间昏暗办公室里坐冷板凳。就在他快到天命之年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临危任命为这家大型企业的领导,也许是“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缘故,他上任后果然不负众望,通过弘扬正气,大刀阔斧开发新品,迅速扭转了连续多年亏损的局面,使企业利润逐年大幅增长,职工收入跟着翻番,接着又大举开拓国际市场,各项经济效益不但跃居省内行业第一,在全国也名列前茅。

由此,我想到前几年在企业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搞坏一个企业仅靠一个厂长不行,但要搞坏一个企业一个厂长就足够了”。记者眼看着他周边一个

个条件比他们好的同类企业接连垮台,职工们纷纷下岗之时,这家当初万事不如人的企业如今不仅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几千名职工也因之而受益,不能不首先归功于他们遇到了这个好领导。对此,我曾在省上的一次会议上对众人感慨:选“好人”、用“好人”干事实是体制之幸,社会之幸,也是职工之福呀。

体制和人的因素孰重孰轻,谁先谁后问题,似乎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悖论。我是个制度决定论者,如今依然主张制度乃至体制对于社会发展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但我同样明白任何制度和体制都需要由人来创立和维系。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制度和体制,好的制度和体制可以有效防止大的过失和错误,同样用好“好人”也可以弥补制度和体制的缺失,将其错误和弊端降低到最低程度,最终推动社会的良性变革。

但好的体制和制度不会从

天而降,更何况处在当今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多如牛毛的空隙,给众多品质低下者提供了胡作非为的机会和寻租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用“好人”干出好事,让大家对社会葆有信心,其实不但是体制之福,对操权柄者也未尝不是一种“恩惠”。前几天媒体披露的某省金融行业贪腐官员,因为结党营私为收受几百万回扣,将银行上百亿信贷资金打了水漂,落了个锒铛入狱的下场。试想如果在审核环节有一个“好人”当道,这些掌门人虽然眼前可能是吃了一点小亏,但最后就会如刘少奇所说的那样占有一个很大的“便宜”。

这位朋友的同行们所执掌的那些企业,垮掉的原因不乏市场因素,但大多是由于领导能力低下、贪腐成风所致。在现行体制下,试想如果上级能给这些企业配备一个好班子,这些企业和职工的命运将会是一个迥然不同的结局;而我这

位“大器晚成”的朋友,如果早些能遇到“伯乐”而脱颖而出,企业得救的是否会更早一些呢?当然假如没有偶然因素,他终老于“垄亩”之中,这家企业怕也难有今日这般辉煌。在历史上,后周的柴世宗若不是英年早逝,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就不会延伸那么久长,试想没有小平先生南方谈话,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如此顺利确立吗?我不是单纯的英雄史观论者,但在关键时刻和特定时期,一个“好人”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绝对不可低估。同样,手中有权的郑筱萸几乎毁了国家药监总局,执掌铁道部多年的刘志军,将整个高铁行业几乎推向绝路。一个奸佞当道,其破坏能量也绝不亚于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对社会的危害。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好人”呢?当然不能像当年阎老西那样让谁来给颁发一个“好人证”,证明其为“好人”,但不等于“好人”的标准也就没有。央视

记者柴静在题为《认识的人,了解的事》演讲中所讲的一段话,说的何其好呀:“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我以为上述演讲中所描述的就是“好人”的一种标准。自古至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只有用好这样的“好人”,让其当道得志,才能给体制增光,才能为民众造福,才能改革和完善体制,有望建立起一个充满公平和正义的社会。(郝振宇)

一场关于银行暴利的讨论再度升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近日公开表示:“银行和实体经济一个利润一个利薄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我算了一下,银行的资本利润率已经不仅大幅高于工业,而且高于石油和烟草,我们都说烟草是最暴利的,石油勘探开采也很暴利,而现在银行业比这两个行业利润还要高。”

如何遏制银行坐收暴利,一些权威人士纷纷开出给力“药方”,比如中国消费者协会会长刘俊海郑重建议,国家层面应依据反垄断法,对银行业进行反垄断审查。

除建议对银行业实施反垄断审查外,其实,我们还可以依据银行业暴利的来源与构成,来点其“命门”。

就目前而言,银行业的暴利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来源于银行存贷利差。据专家分析,我国16家上市银行,去年前三季度的净利差收入超过1.2万亿元,占营业总收入80%,其中五大国有银行为71.7%,股份制商业银行为90%以上。银行业的暴利成分中,存贷款利差收入占到70%—80%的比重。

另一个则来自于银行的新增收费项目。统计显示,2003年10月1日出台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明确银行收费项目仅有300多种,而现在《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列出的收费项目已多达3000种,7年时间增加了10倍。据报道这一部分收费在银行暴利构成中占到20%左右。

正是凭传统的“吃利差”和与日俱增的手续费的二轮驱动,才形成了中国银行业的超高暴利。因此,现在,我们必须向“吃利差”和手续费两项“命门”发力。在当前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短时间内难以奏效,依靠自身无法破解其高盈利的前提下,最好的办法是单边或双边减息,来适度减少银行利差。据金融学者郭田勇测算,倘若采用单边或双边加减息的方式将银行利差缩小0.5%—1%,银行盈利将减少三四千亿。这不仅可以实现老百姓存款的保值或增值,减少居民储蓄的损失,也能从源头上减少银行业的暴利。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要架构一套有效、合理的银行收费机制,先是对银行业的产品和服务价格进行充分的论证,然后,对银行收费项目的成本进行测算,最后召开由专家学者、银行以及消费者共同参加的价格听证会;由银监会、央行、发改委等监管部门,再对银行收费价格是否合理,进行跟踪评估。(吴晋稿)



“一贫如喜”

诱人的扶贫资金和政策优惠,让“贫困县”、“贫困村”等帽子成为许多地方政府争抢的对象。近日,某县电子大屏幕打出“热烈祝贺本县成功纳入国家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字样,庆祝该县成为重点扶贫对象,并称这是县委、县政府“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才获得的。(李嘉)

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目前正在全力打造一项“天字号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61.3亿元,规划面积2456公顷,规划建设2.4万栋温室大棚,预期产业格局年创效益50亿元,吸纳近6万就业人员。县政府将其定性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民生工程”。然而,当地部分群众并不认可政府的“良苦用心”,他们甚至认为这一“天字号项目”是“败家工程”。

俗话说“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尽管当地政府将“天字号项目”宣传得像朵花,可还是经不住细致的审视和拷问。比如,前期建设的“38栋实验大棚”已经荒芜损坏,新建的两处砖瓦窑未投产即马上拆毁,用上百万元的别墅当“种子商

店”。为何一项被政府当做“民生工程”的项目,会成了群众眼里的“败家工程”?

群众将“天字号项目”斥为“败家工程”,其背后饱含着对地方政府施政“怨其不争”的愤慨。因为,谁也不希望自己的缴纳的税款被如此无度挥霍,谁也不希望地方政府拿着财政资金做着对地方长久发展无用的投资。可是,地方政府却不这么认为,“天字号项目”的建设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无比诱人的GDP,创造辉煌的政绩效应。

其实,“天字号项目”建设的真正目的是开发旅游和房地产。果蔬基地所在地块已被规划为商业用地,虽然声称所建房屋主要用于经营棚室生产所需的种子、农膜等生产资料,可

事实却是,开发商公开叫卖价值上百万的别墅,优惠条件是“买别墅送大棚”。名为“种子商店”,实为地产项目!此外,当地还提出加快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定位发展成为世界寒地温泉休闲城市。

明明是赤裸裸的商业开发计划,却打着“民生工程”、“惠民工程”的幌子,而果蔬基地的发展这一肩负产业结构调整重任的工程则成了一种陪衬,显然有违政策初衷。即便如此,当地先是不顾土壤为盐碱地“只能长庄稼,不能长蔬菜”的事实,盲目建设温室大棚,而后是大面积荒废大棚和土地,造成公共财政的严重浪费。权力如此乱作为,难怪要被群众斥为“败家工程”了!(禹海君)

读书

名人出书,一直都是出版领域的热点话题,不论是名人自传,还是圈内隐私,都能引发一段议论,跻身畅销书行列,自1995年赵忠祥的《岁月随想》销量过百万,名人出书热就一发不可收拾,不但将国内名人一网打尽,甚至许多名人一出再出。

不过,近两年,名人出书热似乎正在降温,名人出书遇冷的现象时常出现,当年一本书销量百万的盛况不复再现,甚至一些名人的书籍无人问津。

究竟是名人的影响力开始下降了,还是读者的口味变了?做过《蒋介石画传》、《邓丽君画传》等多部畅销书的著名出版人师永刚说:“和名人有关的书籍,如名人传记、名人日记等,从来都是畅销书中的一员,国内名人出书现在变得不好卖,一方面是这些书籍太过于重复,写作质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是缺少真正有超越世俗意义上的名人,此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也使得人们对于名人的好奇心在减弱。”

有点名气就写书

师永刚说:“央视的几位名主持人出书,销量非常好,也正是他们引发的名人写书热潮。鼎盛时期,销量百万的书也并不少。然而,热潮起来之后,到了第二阶段,大量的名人出书,包括许多二线的名人,甚至一些还不具备出书条件的人,也纷纷写书,他们本身的影响力和读者号召力就不太够,因此想要热销也就有些困难。”

二十来岁就感悟人生

质量问题第一个现象,就是千篇一律,名人写书,总是那么几个套路。

名人本身的经历不足同样也是名人书变冷的原因。师永刚说:“一个人总结自己的一生,总要有了一定的经历才行,现在很多出书的名人本身年纪就不大,大点的四五十岁,年轻的二十来岁,出版社一邀请,就把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给总结了,但是他们几十

名人传记常常承担着这个功能,然而在今天,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师永刚说:“名人书有两大功能,一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人们对名人总是想知道更多,包括名人的隐私。过去,名人把他们的生活经历写进书里,自然会有人想看。但随着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媒体的功能变强,人们有很多方式可以了解名人的一切,而且一些名人自己不想

内容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现在名人丑闻太多,今天你还在书里说自己怎么样,明天可能网上报纸上就有丑闻被爆出来,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名人也就不再有敬仰,自然也谈不上励志了。”

有分量的名人太少

名人书的冷落,是否意味着延续了十多年的名人出书热将逐渐退去?

师永刚说:“其实不是,名人传记从来都是畅销书的一员,现在名人书不热,其根本原因是质量问题。不仅是写作质量,也有名人本身的质量。人们还是希望看到高质量的书籍,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乔布斯传》,在全世界范围内畅销,就是以说明问题。而我们现在,缺乏像乔布斯这样真正超越一时一地、超越现实生活的名人,很多名人的经历和普通人的没什么两样,他们的事业也不出奇,自然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

所以,名人书要再创辉煌,其实还是在名人本身。(周怀宗)

读书不妨“破一卷”

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在当今社会,作为一名职业人,在单位忙于工作应酬,在家庭忙于生活琐碎,想要读书破万卷,是可想而不可及的事情。

古今往来,书籍浩瀚如海。读书,能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固然是好,然生命有涯而知无涯,作为当代读书人,在有限的时间内,必须懂得“约取之道”,贵在“破一卷”。

读书“破一卷”,是指我们从一开始,就要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破”一卷书。读书破一卷,首先要根据个人喜好和工作需要,学以致用,精选一部好书,深钻细研。古人云:“水停以鉴,火静其明”,说的是只有心静脑清,吸吮知识才能如海绵吸水;只有心胸明亮,才能潜入学海豁然贯通。正所谓“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读书学习,于此类同。我们只有一心一意静读求知,心不外驰,“致意不懈”,“予一而贯之”,才能学得进,记得牢,有所感,有所得。

不仅如此,读书还要结合实际思考,知疑善思,闻一知十。古语曰:知疑则思通,善思则睿智。可见,读书贵在多疑多思,熟读精思。宋代理学家朱熹指出,“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有疑;过了这一番,疑则渐解,以至于融会贯通,都无疑义,方始是学。”

提倡破一卷,还在于“书读百遍,其意自见”。读一本好书,不但要反复咀嚼,还要真心实意,方能得其真知和真谛。毛泽东同志仅《资治通鉴》就读了17遍,《共产党宣言》读了不下百遍。但在生活中,我们常发现,不少人也喜欢看,却没有精读一本书的习惯。未通于前,又学于后,未通于此,又学于彼。囫圇吞枣,走马观花,不熟读精思,自然就谈不上感悟和收获了。

总结起来,提倡读书“破一卷”,益处有四:利于选择读书学习的方向,以免浮泛芜杂;利于求精求深,从一开始就聚精会神,由精到博,博而不乱;利于惜时,“破一卷”既能达到求精的目的,又能学到有用的知识,比不求甚解的读省去了很多时间;利于砺志,久读不厌,常读常新,读书专一,其志亦坚。(解帮)

2月2日,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在微博上透露张爱玲译《老人与海》、《鹿苑长春》将合集《张爱玲译作选二》在港台出版。张爱玲译《老人与海》曾经在香港出版过,但已绝版多年,

是她最钟爱的一本外国小说。据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介绍,1952年,海明威发表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刊登这篇小小说的美国《生活》杂志在48小时之内竟售出了530万册!也就在这一年的7月,张爱玲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她先在香港大学文学院注册,准备继续未完的学业,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

年的人生经历根本不足以写一本几十万字的书,可写的东西少了,支撑不起来,往往就会注水,从小学逃课、到情感故事,都放进去,有的和流水账一样,谈不上精彩,自然人们也就不会喜欢。”

名人书的功能变小

名人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不论是他们身上的光环、背后的隐秘,还是他们成功的道路,都会成为人们探究的对象。过去,

说,不会写在书里的东西,媒体上也有,这就降低了人们对名人的好奇心,很多东西都已经知道了,或者很容易知道,就不再需要买书去专门了解。”

名人书的第二大功能,是励志。师永刚说:“名人如何成功的,往往是读者感兴趣的地方。但实际上,今天的许多名人,他们的人生经历没有多少可以说的,正如前面说的,名人书中的

内容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现在名人丑闻太多,今天你还在书里说自己怎么样,明天可能网上报纸上就有丑闻被爆出来,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名人也就不再有敬仰,自然也谈不上励志了。”

有分量的名人太少

名人书的冷落,是否意味着延续了十多年的名人出书热将逐渐退去?

师永刚说:“其实不是,名人传记从来都是畅销书的一员,现在名人书不热,其根本原因是质量问题。不仅是写作质量,也有名人本身的质量。人们还是希望看到高质量的书籍,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乔布斯传》,在全世界范围内畅销,就是以说明问题。而我们现在,缺乏像乔布斯这样真正超越一时一地、超越现实生活的名人,很多名人的经历和普通人的没什么两样,他们的事业也不出奇,自然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

所以,名人书要再创辉煌,其实还是在名人本身。(周怀宗)

2月2日,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在微博上透露张爱玲译《老人与海》、《鹿苑长春》将合集《张爱玲译作选二》在港台出版。张爱玲译《老人与海》曾经在香港出版过,但已绝版多年,

是她最钟爱的一本外国小说。据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介绍,1952年,海明威发表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刊登这篇小小说的美国《生活》杂志在48小时之内竟售出了530万册!也就在这一年的7月,张爱玲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她先在香港大学文学院注册,准备继续未完的学业,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

弥漫着幽默、温馨与感伤。张爱玲也在“译后”写到,“有一种书,是我们少年时代爱读的作品,隔了许多年以后再看起来,仍旧很有兴味,而且有些地方从前没有注意到的,后来看到了会引起许多新的感触。像这本《鹿苑长春》就是一个例子。”

陈子善说,张爱玲翻译的这部《老人与海》及她的初版本译

老大哥死了,世界会怎么样?

老大哥死后的世界——《1985》中译本出版

老大哥死了,世界会怎么样?匈牙利著名作家、历史学家道洛什·久尔吉的代表作《1985》,写于1981年,但直到1990年匈牙利体制改革之后才在国内出版。本书续写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取自《1984》。全书一开篇,就写到1985年1月,国家医疗特别委员会报告:去年12月10日零时32分,“老大哥”病情恶化,由于伤风流涕,不幸病逝。“1984”的世界松动了。

紧接着,上层最先酝酿变革,秘密警察奥勃良创办《时代》文艺副刊,邀请被他折磨拷打过的温斯顿·史密斯担任主编,一切在朝着看似乐观的方向发展,然而实际上“铝派”和“纸派”开始争权,“自由”并没有可预见的那么好。道洛什·久尔吉曾在莫斯科

留学,加入过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68年,大学毕业一年的他因为“毛派分子案”被禁止发表长达十多年,以至于他放弃母语改用德语写作。正是由于作者的独特经历,他的主要作品都聚焦于冷战时期的东欧社会,再现了“铁幕”下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2010年,道沃什新作《帷幕》升起:东欧独裁者的垮台获得德国莱比锡书展大奖。

曾有消息称,因为先有《1985》的存在,村上春树才将向奥威尔致敬的小说命名为《1Q84》。(赵大伟)



张爱玲译《老人与海》将出港台版

在旧书市场上价值不菲。大陆方面,宋以朗透露一定会出,但还没有具体时间表。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张爱玲是第一位将《老人与海》翻译成中文的译者,而这本书也

来,张爱玲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新闻处找到一份翻译工作,参与大规模的美国文学作品中译计划以维持生活。张爱玲的《老人与海》中译本于1955年由香港中一出版社出版,同年秋天,张爱玲就漂洋过海移居美国了。

至于《鹿苑长春》则是美国名作家玛乔丽·劳林斯荣获“普利兹奖”的代表作,讲述一位少年与小鹿之间动人的情谊,全书

序一直未能进入张爱玲研究者的视野。这对张爱玲研究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所幸,本次出版将加入出版的序言,“由于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她所翻译的《老人与海》及初版本译理应受到特别的关注,何况,这还是《老人与海》最早的中译本!”(欣华)